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HAN YU GUO JI JIAO YU DAO LUN

刘谦功
著

界园书出版公司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刘谦功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刘谦功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 5

ISBN 978-7-5100-4652-0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IV. ①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1781 号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著 者: 刘谦功
责任编辑: 陈晓辉
封面设计: 董莉丽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8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652-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研究获得北京市共建项目“汉语国际教育体系研究”支持

序

刘 珣

非常高兴地看到刘谦功教授即将出版的新作《汉语国际教育导论》的书稿。

尽管近年来已涌现不少有关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导论”、“教学论”以及“教学法”方面的书，但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阐述，对汉语教学规律的探讨，仍然是我们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弱项。与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以教师培养和教师资质的认证为例，首先强调实践能力，特别是课堂教学实践的能力是必要的：教师的“天职”是上好课。但实践能力如何培养？课堂教学能力如何提高？仍然离不开理论知识的指导。不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不了解汉语教学的规律，所谓的实践能力只能是机械操作的能力，只能成为没有任何创造性、只会“依葫芦画瓢”、缺乏因地制宜应变能力的“教书匠”，而无法适应 21 世纪“后方法时代”汉语国际教育对教师提出的要求。

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还因为我们面临着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所谓“汉语难”这一汉语教学的特殊问题。汉语对无论是南北美还是东西欧，甚至印度、中亚的学习者来说，都是与他们的母语谱系关系十分遥远的、陌生的目的语，汉语的不同于形态变化的语法手段，特别是汉字和声调这两大难关，使汉语成为绝大多数学习者难学的“真正外语”。一般说来，西方的教学理论所揭示的第二语言教学的普遍规律对汉语教学也是适用的，但像上述汉语教学的特殊问题，不可能指望在现有的西方教学理论宝库中找到答案，盲目地照搬“亲属语言”之间的教学方法，只能使汉语教学走入歧途。

显然，以加强学科的理论研究为龙头，建设一个能作为强有力后盾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是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非常需要论述学科理论和教学理论的、有新意的著作，刘谦功教授的这部新作正是适应形势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与同类理论著作相比，《汉语国际教育导论》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首先，“新颖”是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同于许多论述对外汉语教

学的著作，仅局限于总结和论述我们在国内对来华留学生教学的经验，本书是从21世纪的汉语国际教育这一新的视野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做到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书中谈到了汉语正在加快走向世界的一些状况，论述了孔子学院有异于歌德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的一些本质特征，特别强调了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的关系，对来华留学生的实习、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都有专门章节阐释，这些都是以前的理论著作很少涉及的。视野的宽广源于作者十分丰富的工作经历，刘谦功教授不仅在北京语言大学有过长期的教学和教学管理经验，还曾在保加利亚、荷兰和韩国长期任教，当过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并多次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或香港地区讲学，她对国内和海外的汉语教学有着较敏锐的观察与较深入的研究。

第二个特点是“多元”。我们的世界是个多元化的世界，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多元的综合学科。这门学科至少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跨文化交际学、传媒学、文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一根筋”，只强调某一门学科，是很难揭示它的丰富多彩的面貌的。本书的构思正是体现了多元综合的特点。除了学科的综合外，还有时间与空间——古今中外——的综合、教与学的综合、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等等。

第三个特点是“哲理”。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论述教育学或教学论的著作，按教育或教学的框架逐条阐述；而是从哲理的高度进行考察，用发散性思维方式阐释理念，不拘于一时一事，重在发人深省。这一特点从书中的小标题上就不难看出：“固本培元”、“执简驭繁”、“贵在得法”、“术有专攻”、“异中有同”、“随机应变”、“当务之急”、“长久之计”等，引人入胜，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后面两个特点与刘谦功教授所受的教育和所研究的领域有关。她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京语言大学获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教育学硕士学位，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她在中国语言文学、对外汉语教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方面都有着坚实的专业基础，涉猎范围很广，曾出版专著《中国艺术史论》，发表多篇有关汉语国际教育、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等方面的文章，这种学术背景使本书思路开阔，文笔潇洒，不同于一般过于严肃的理论书籍，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

作为同事，我与刘谦功教授相识多年；她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我曾是我的导师，因而也算是知其人而论其书了。我认为，对从事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教师与志愿者们，对关心或有兴趣了解这一新专业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的轨迹与今天的面貌	1
第一节 回望历史	1
一、汉语之所以为汉语	2
二、大唐盛世的游方与留学	4
三、西风东渐与中学西传中的汉语教学	9
第二节 还看今朝	15
一、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	16
二、海外的“汉学”与“中国学”	19
三、中外合作的孔子学院	25
本章小结	38
第二章 多元化的观念与多样性的做法	39
第一节 纷繁的教学对象与教育背景	40
一、从中国走向世界	41
二、适应全球语言文化的多元化	44
第二节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52
一、英语教学与法语教学	52
二、歌德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	60
第三节 以不变应万变的基础与随机应变的能力	63
一、“固本培元”的重要性	63
二、“执简驭繁”的必要性	70
本章小结	73
第三章 理论的深入与实践的浅出	75
第一节 汉语要素“要”在哪里?	75
一、完备封闭的语音系统	76
二、动静相宜的词汇意义	78
三、辩证统一的语法关系	81
四、神形兼备的文字结构	86
第二节 汉语的与时俱进	90

一、媒体语言的引导作用与规范问题	91
二、并非一成不变的汉语语音	93
第三节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	94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有利因素	96
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难点	97
第四节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念与原则	102
一、宜简不宜繁	102
二、语法、语义、语用并重	106
三、螺旋式上升	109
本章小结	111
第四章 教无定法与贵在得法	112
第一节 汉语要素的“教”与“学”	112
一、语音教学与正音问题	112
二、词汇教学与学以致用	115
三、语法教学与造句能力	118
四、汉字教学与文化认知	121
第二节 汉语技能的教与学	124
一、大综合——听说读写兼顾	125
二、分技能——以点带面相互促进	126
三、小综合——融会贯通之法	138
第三节 汉语交际的教与学	143
一、交际的准确性	143
二、交际的得体性	144
三、交际的可行性	147
本章小结	148
第五章 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	150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51
一、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151
二、语言对文化的承载	157
第二节 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相辅相成	160
一、怎样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	161
二、“厚今薄古”问题	165
三、注重交流与互动	169
第三节 来华留学生实习的组织与运作	171

一、留学生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172
二、留学生实习的组织和运作程序	172
三、关于留学生实习的理论探讨	176
四、留学生实习实例分析	178
第四节 孔子学院文化活动策划	181
一、怎样介绍当代中国?	182
二、向学生介绍哪些中华文化基础知识?	183
三、传统文化才艺对汉语教学有什么辅助作用?	186
四、怎样处理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187
五、怎样组织一次文化活动?	188
本章小结	195
第六章 术有专攻与学贯中西	196
第一节 不断扩大的本科专业领域	197
一、汉语言专业方向越来越多	198
二、中国语言文化专业范围越来越广	207
第二节 专门用途汉语教学越来越成熟	212
一、商务汉语的基本特点	212
二、旅游汉语的教学实践	214
三、科技汉语的课程设置	216
四、医学汉语的学以致用	218
第三节 面向全世界的研究生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21
一、理念上的全球视角与区域视角	221
二、方法上的“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	226
本章小结	230
第七章 当务之急与长久之计	231
第一节 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	231
一、从国际化到国别化	233
二、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240
三、从静态观到动态观	249
第二节 如何使当务之急转化为长久之计	252
一、办法永远比问题多	252
二、实践与理论循环往复	254
本章小结	260
参考文献	261

第一章 历史的轨迹与今天的面貌

对外汉语教学乃至汉语国际教育是指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自然也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需要通过语言，然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使用的语言不一样，这就需要互相学习与掌握彼此的语言才能沟通。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因此外语的学习也由来已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亦在其中。现在我们就来回望一下历史的轨迹，再看看今天的面貌。

第一节 回望历史

“汉语国际教育”的说法是近年来才时兴的，然而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其历史的轨迹却是悠远而漫长的，至少可以说肇始于汉代、兴盛在唐代、延续至清代。当时外国留学生、学问僧不拘一国一地，西起安息与天竺，东至高丽与日本都有来求学问道的。他们或以经商、传教为目的而着重于口语，或以研究汉学为目的而着重于书面语。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①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②可算影响较大的汉语教材。我们应该回头看看历史，以史为鉴，无疑会使我们把今天的工作做得更好。

① 《西儒耳目资》：明末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编著的一部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罗马字注音专书。1625年，金尼阁对利玛窦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次年在杭州出版，即《西儒耳目资》。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为《列音韵谱》，从拼音查汉字；第三编为《列边正谱》，从汉字查拼音。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个字母（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就可以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这种比“反切”简单得多的方法引起了相关学者广泛的注意和兴趣，有些学者还萌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

② 《语言自迩集》：清末英国人威妥玛编著的一部权威性的北京话教材，1886年第2版。该教材系统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音系。作为课本，它是语音、汉字、语汇、阅读并重的，书中1500多条注释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其价值其实已远远超出学习汉语本身，同时还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史料。

一、汉语之所以为汉语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分析语^①，有声调，其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表意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表音功能。汉语包括书面语与口语两部分，古代书面语被称为文言文，现代口语方言众多，而书面语则相对统一。今天的汉语，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与文化大融合的结果，而且还吸纳了世界上诸多语言与文化的精髓。今天的汉语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历史上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与政体一脉相承的统一性。

秦汉帝国为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之奠基者，其基业一贯中国历史两千年，在中国语言文字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创帝制、筑长城、统一文字，进而开疆拓土，创立了不世伟业；汉朝是紧接秦朝之后的强大帝国，仍处于中华帝国的形成期，汉武帝对内励精图治、建制立法，对外抗击匈奴、开通西域，以睥睨天下恢宏气度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秦汉所确立的政体和社会组织形式延续了两千年，确立了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其影响更是远迈古今，而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风靡世界”的汉语，同样在那个时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在其内部也有千变万化，但它依然是一个统一体，依然维系着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血脉。

关于汉语关键性的变迁，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一书中指出：

语言和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平时变化非常慢，甚至不容易觉察到有什么变化，遇到社会急剧变动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就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秦并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大变动。这时候实行以秦国文字为标准书同文政策，废除了六国文字。古代交通困难，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实行书同文已经极不容易，进一步实行语同音是不可能的。

1912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变动。这时候，语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方言分歧的汉族开始要求大家

^① 分析语：又称孤立语或词根语，其特点为一般不是通过词形变化（即词的内部形态变化，又称作屈折变化）来显示语法作用，而是通过独立的虚词和固定的词序来表达语法意义，分析语一般缺乏性、数、格等方面的变化。

学习国语，实行语同音；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正宗，统一汉字读音，反切改为注音字母。这是中国语文向现代化前进的第一步。^①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方面功不可没，徐通锵先生在《编码的理据性和汉语语义语法形态的历史演变》一文中指出：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特殊性形成了汉语、汉文化研究的独特传统，在语言中的表现就是“重文轻语”。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书同文”的政策，基本上不管“言异语”。这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就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而言，“文”在汉语结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书面语的规范化不断巩固和加强“文”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来控制和影响“语”的演变。例如，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就是以“文”来调节方言的发展速度和演变方向的一种重要力量，使其不能超越与“书同文”相对应的汉语结构格局所能控制的范围。印欧语的情况与汉语有别，它“重语轻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随着文艺复兴，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方言特点发展出不同的拼音文字，从而架空权威的拉丁文，使它走向消亡；欧洲所以成为一个小国林立的地区，这种“重语轻文”的传统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②

我们暂且不用追溯到先秦时期太遥远的历史，就回望到秦朝与汉朝；我们也暂且不用深入发掘汉字的文化内涵，就看它在维系中国各民族关系方面的作用，便已可知汉语与政体一脉相承的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统一性正是我们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对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是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来便如此，而作为这样一个大家庭，又与异域文化多有碰撞与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语言方面的沟通，汉语有今日，也是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广泛地吸纳外国语言与文化因素的结果，张骞通西域便是很好的例证，此前在中国关于西域各国几乎无史籍记载，而后来张骞的所见所闻均见于《史记》与《汉书》，

① 周有光：著者前言，《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V页。

② 徐通锵：《北大中文文库·徐通锵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张骞及其后来人所开辟的丝绸之路更成为千古称道的中西文化之间的桥梁，因其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域的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科学如天文、历算、医药等，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均通过此路先后传到中国；同时中国的工艺技术如纺织、造纸、印刷、制瓷等，专利产品如火药、指南针等，思想流派如儒、道、法、墨等，也通过此路传向西域，在这种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过程中，语言自然是功不可没的，其时人们或用此语，或用彼语，再借助其他非语言手段，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大交流、大沟通。“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这两个文明的互相渗透。西方学者赫文斯定、斯坦因等，先后在楼兰废墟、犏羌、尼雅、和阗一带发现丝绸之路的遗迹、遗物，如毛笔、竹简、木牍、纸、残绢、古钱、汉镜、陶器、《战国策》残卷，以及梵文贝叶、佉卢文^①、婆罗文、宰利文的文书等。经过中外专家长期研究佉卢文书之谜得以揭开，它属于拉美尔文的一个支系，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方言，最早流行于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2世纪传入大夏，以后传入塔里木盆地一代，成为那里的通行文字。”^②从这些史实和史料可以看出语言在东西文明互相渗透中的作用及其不断被丰富的结果，汉语自然也在其中。

简言之，在秦汉时代汉语有着与政体一脉相承的统一性以及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正因为如此，汉语才成为我们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中华民族的共同语。

二、大唐盛世的游方与留学

唐朝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人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300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内和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混融互化，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从而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

^① 本书作者注：佉卢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国，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原文为 Kharosthi，全称“佉卢虱底文”，最早在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一带使用，公元1~2世纪流行于中亚地区，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公元4世纪中叶随贵霜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揭开了奥秘。

^② 樊树志：《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7~138页。

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① 在唐代的中外文化大交融中，“游方”与“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两种活动。

若论大唐盛世的“游方”，最著名的莫过于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了。他们分别向西与向东传播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其影响在空间上的广博与在时间上的久远至今都是难以估量的。

玄奘^②为唐代高僧，十三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游方各地讲学问难。据其所撰《大唐西域记》记载：“年方三十，志立学成，既居禄位，先酬师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贞，沈浮物外，逍遥事表，宠辱不惊，声闻以远，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国重聪睿，俗贵高明，褒赞既隆，礼命亦重。故能强志笃学，忘疲游艺，访道依人，不远千里。”^③ 武德末年，他来到长安大庄严寺。在研习佛经时，他博览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颇多，疑有译经时的谬误，故发愿至佛教发源地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中印度僧人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描述了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及其所授《瑜伽师地论》的精到，更坚定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经凉州，越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终于从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地游历，拜谒佛教六大圣地，于贞观四年到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他曾在戒日王主持下经过辩论战胜五天竺大小乘所有论敌，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九年，他携带佛经、佛像与花果种子回国。玄奘历时十余年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堪称中古史上一次伟大的旅行。《大唐西域记》是玄奘撰写的关于西域的地理与历史的著作，里面特别提到了语言问题：“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④ 玄奘的西行带出去了汉语，历经了汉语与其他国家与民族语言的顺利与不顺利的交流，还带回了异域语言，为中外语言的交流与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樊树志：《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19~220页。

② 玄奘：600（一说602）—664，俗姓陈，名祿，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

③ （唐）玄奘撰，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92页。此段原书译文为：“学生年岁到了三十，志向已立学业已成，当官受禄后，先要报答教师的恩德。也有人崇尚古风，爱好清雅，隐遁之意坚贞，沉浮于俗务之外，逍遥于世事之表，受宠受辱皆不惊慌，声名远扬，君王十分欣赏他们，却不能使他们遵命而至。不过国家重视聪明饱学之人，世俗尊敬德行高雅之士，褒扬奖励很隆重，礼敬也很崇高。所以人们能志向坚定，刻苦求学，忘记了疲劳，访求有道之人，归依仁爱之士，不以千里为遥远。”

④ 同上，第10页。此段原书译文为：“人的性情有刚强有柔顺，语言发音也有不同，这是由于风土的气质，也是习俗所导致的。”

鉴真^①亦为唐代高僧，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14岁在扬州出家向佛。由于他刻苦好学，中年以后成为非常有学问的和尚。唐开元十一年（724），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六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754（天平胜宝六）年2月1日鉴真一行抵达难波，4日入平城京，被安置在东大寺。5日道璇、菩提仙那前来慰问。右大臣藤原丰成、大纳言藤原仲麻吕以下百余名官员也前来拜访。吉备真备作为钦差前来宣诏慰劳鉴真，宣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②4月在大佛殿临时设戒坛，鉴真为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授大乘菩萨戒。不久又为没有受过足具戒的440余名沙弥授戒。另80多名已受过戒的僧侣也纷纷舍旧戒，重新从鉴真受戒。之后在大佛殿以西建戒坛院，确立了授戒场地。又建了唐禅院，作为僧房。756年5月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弟子法进任律师，同列僧纲。但两年后的758（天平宝字二）年8月，淳仁天皇即位，下诏表彰鉴真的功绩，为使鉴真摆脱僧纲的琐事，专心教授戒律，而尊之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职，并相继将新田部亲王的旧宅赐给了鉴真。鉴真建戒律道场于此，命名为‘唐律招提’，这就是唐招提寺。招提是僧侣共同居住的僧房、道场之意，唐朝把与官家寺院相对的私人寺院叫做招提。称为唐招提寺是由于其设立后被收为了官寺。”^③鉴真留居日本十余年，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他带去了大量书籍与文物，随他过去的人有懂艺术的，有懂医学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所学用于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汉语功不可没。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庙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两年后该寺建成，成为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

以上两个实例是中国人走出去的，下面再说说外国人走进来的。大唐盛世万国来同，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者大有人在，在这些国家中，韩国^④与日本似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⑤。

韩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早在新罗时期就有许多留学生入唐学习。“崔致远在新罗留学生中最为著名，于唐咸通八年（867年）入唐，临行前，其父勉励曰：‘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唐乾符

① 鉴真（688—763），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曾6次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后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日本人称之为“天平之藁”，意思是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高峰。

② 原文注：井上光贞. 日本古代的国家 and 佛教 [M]. 东京：岩波书店. 1986. p. 906.

③ [日] 中村顺昭撰、葛继勇译：鉴真东渡及其影响，《唐都学刊》，2007年第6期。

④ 那时是新罗时期。

⑤ （宋）俞文豹：《清夜录》。

元年（874年）及第，历任宣州溧水县尉、淮南节度使高骈的从事官、都巡统官。在唐十六年期间，崔致远登科、任职，得到皇帝的知遇，并赐紫金鱼袋，扬名文坛，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晚唐著名诗人顾云曾写诗赠崔致远曰：‘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剑射破金门策’，对其文学才华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唐中和四年（884年），崔致远回到新罗，历任侍读、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知瑞书监等职。……崔致远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学方面，他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汉文作品的大家，其作品风格多样，题材丰富，内容深刻，在韩国汉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韩国古代汉文学的奠基者，《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了他的著作和简历，《四库全书》收入了他的《桂苑笔耕》，他的不少作品载录于《全唐诗》、《唐宋百家歌集》、《东文选》中。”^①崔致远不避求学之远故而有学问之远，鉴古知今，现在的韩国人依然推崇“孔孟之道”，喜读《三国演义》，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非常著名的北京语言大学，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韩国留学生的毕业论文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孔孟之道”和《三国演义》的，其中不乏颇具新意的作品，如2008年毕业的洪银英的论文《关于秦朝与隋朝兴亡的思考》就特别关注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封建社会两个最兴旺发达的朝代汉朝和唐朝之前都有一个短暂却颇具影响力的朝代；又如2009年毕业的徐正彬的论文《论〈三国演义〉永恒的反派吕布》对吕布的评价就与传统观念不同，对吕布反贬为褒，并指出了人们对吕布的偏见所在。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不亚于韩国人，在唐代，日本不断地派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同时也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北京大学教授阴法鲁曾在《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一文中列举了一系列史实：“中国音乐大量地传入日本。《大日本史·礼乐志》说：‘推古朝（593—628），皇太子厩户最好而讲之，于是韩、吴诸乐始行于世。’‘时方通西土（指中国），故伶官又传隋唐之乐。’所谓韩乐即朝鲜音乐，传入日本较早，但已受中国音乐的深刻影响。日本文武天皇天宝二年（702），设立‘雅乐寮’，有唐、高丽、新罗及伎乐等乐师。当时传去的隋唐乐曲有一百五十多个。在乐制方面，《大日本史·礼乐志》说：‘本朝所传乐制，五声六律轻重之法，不可得而详也。盖其使受之于隋唐。’日本接受隋唐乐制后，其中有些名称曾加以改动。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在中国留学十几年的吉备真备回国，

^① 李梅花：入华留学生与古代中韩文化交流，《东疆学刊》，2009年第3期。

他带回去的许多文物书籍中有铜律管、方响^①、《乐书要录》十卷。^②《乐书要录》相传为武则天所撰，在中国到宋代就失传了，日本保存的现在也只剩了三卷，有论乐律问题的重要材料。律管有用竹制的，有用玉制的，也有用铜制的，是定乐律的标准仪器。这些器物 and 书籍对发展日本音乐是起了作用的。”^③ 这些器物和书籍对发展日本音乐能起作用，自然离不开汉语，中国音乐在日本的传播过程，自然会带动汉语在日本的传播。

古有遣唐使，今有遣中使，今天日本依然继承着古代的传统，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派遣各种人员。例如，日本北陆大学自1975年建校以来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先后和中国20余所大学签订了姊妹院校、友好院校交流协定，实施共同教育计划，包括互派留学生、教师交流、合作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自1994年起，日本北陆大学每年暑假都仿效历史上的遣唐使，组织北陆地区大中学生以“平成遣中使”的身份来中国参观访问，实地体验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多彩的现代风貌，迄今已有千余人参加了此项活动，访问过中国30余个城市，这项活动不仅继承了中日友好的传统精神，也增进了日本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为搭建未来的中日友谊桥梁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有“遣中使”的日本北陆大学孔子学院（刘谦功摄，2012年）

① 本书作者注：方响是中国古代的敲击乐器，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557—581），后为隋唐燕乐中经常使用的乐器，它通常由十六块晋板根据膏高顺序排列而成，用小铁褪或木褪敲击发音。

② 原书注：《续日本记》卷一二。

③ 阴法鲁：《北大中文文库·阴法鲁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